

周殿富 /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现代

领导学



现代

周殿富 /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领导学

(吉)新登字02号

现代领导学

周殿富 著

责任编辑:郑长利

封面设计:曲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625印张6插页423,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刷: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印数:1—1,000册 定价:14.00元

ISBN 7-5383-1967-0/G·1727

序 言

谷长春

领导活动是实践，也是一门科学。

对于一个现代领导者来说，要做好领导工作首先需要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因为领导经验是领导干部在领导活动实践中的一种亲历亲知，实践是科学之母，没有实践就没有科学，因而这经验中自然包含着科学的因素。但我们亦需看到，经验并不因此就等于科学。因为任何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具体经验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所反映的都是“特殊”，而不是“一般”，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普遍规律。因而我们不能不说，领导工作离不开经验，但更需要科学的指导。尤其是在日益纷繁复杂的现代领导活动中，更需要有一门反映现代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来为我们的领导工作当好参谋，提供理论的参照。周殿富同志作为有心人和有志者，结合亲身经历，多年来在这方面进行学习和研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对现代领导活动所涉及到的领导活动要素、领导活动主体、领导境况、领导动力、领导人才、领导人格、领导方法与艺术等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撰写了40余万字的《现代领导学》，我想这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好，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

在于我们党”，“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不懂得、不熟悉的东西很多。全党同志必须边实践边学习，把坚持学习作为紧迫而又长期的重要任务。不仅要抓紧学习政治，而且要抓紧学习经济，学习先进经营管理，学习现代科学文化，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这是对全党的要求，但首先是对每一个领导干部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发表与党的十四大召开以来，形势发展变化很快改革不断深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我们面临许多新情况、许多新问题。形势发展之快常常使我们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昨日黄花。靠传统的办法、习惯的思维方式和以往的领导经验来认识、处理问题，很难与之相适应。因此，我们必须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头脑，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也需要去努力学习与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这当然应该包括领导科学在内。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我们不仅需要领导科学，我们更需要在实践中去实行科学的领导。

实行科学领导首先要有科学的决策。如果说在领导活动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那么决策的科学则是最大的科学。在领导活动中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组织目标的确立；小到一个群体机制的建立，发展规划的实施，规章制度的实行，都是领导决策的产物。这个决策的科学、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领导的水平和结果。科学决策的形成，既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也需要有创造的精神；既需要领导者的调查研究与周密思考，也需要有充分的民主，群策群力；既需要瞻前“鉴往”，也需要顾后“知来”。在现代领导活动中，如果

没有一个科学决策的机制，缺少科学决策的程序，不懂科学决策的方法，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实行科学的领导，首先是有胜任的领导人才和领导集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一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任何一个地方和单位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没有一个好的“班长”，那里就不会有希望。因此，要想实现科学领导，就必须选配好各级领导班子，按照党的“四化”要求，把那些德才兼备的，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高度革命事业心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领导人才，选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否则，就会出现低效低能、无所作为的领导现象。然而，在实践中不少同志往往总在忙于“领导”，而忽略了“人才”。

实行科学领导，还应该体现在如何充分调动下属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上。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了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文明的直接创造者。因而，做为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不能见物不见人，要想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你必须首先去关心自己的下属，解决好群众的切身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掘人们的巨大潜能。领导科学不只是研究领导者的科学，领导活动也不只是领导者的活动，而是领导层通过骨干带领人民群众一道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组织目标的社会实践。

实行科学领导，必须懂得抓战略、统全局、理要政实行科学领导，还要务实际，讲实效，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为结合实际的各项措施，并把它落到实处。

总之，从事各项领导工作的同志应该认真地学习、总结、掌

握、运用科学的现代领导方法与艺术，在领导活动的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领导素质，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周殿富同志的《现代领导学》，在以上各个方面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探索，值得各级各类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一读，相信会有所裨益。

1993年2月

领导与科学的历史断想

（代前言）

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

—— 恩格斯

I

人类的历史就象一条河。

一条从新生代第三纪的上古洪荒中奔来的河。

一条曲曲折折的河，一条不止不歇、川流不息的河。

一条历尽荒凉的山谷和遍布忧患的原野，流向繁荣的河。

千百年来，它流过了古新世野藤缠绕的森林，流过了始新世刚刚长满青草的荒原，流过了中新世那些拔地而起的新生代山脉，流过了更新世漫长的严酷冰川，流过了从全新世到近代世界的一个个部落遗址和王城废墟后，昂然跨入了现代社会的领土。在这漫长的历史流程中，它留下了无数枯燥的涸床，留下了许多填满风沙的故道，也哺育了一片片至今郁郁葱葱的绿洲和世代生息繁衍的生命。

千百万年来，这条河有裹挟风云之急流，有微澜不兴之平缓，有一泻千里之直前，也有一波三旋之逆回。它吞没过无数泱泱帝国，也托起过飘摇的沉舟。有过汪洋恣肆的壮阔奇伟，也有过跌入谷底深深……。在它流经的地方，岩层、化石、古堡遗址、悬棺、壁画、古墓、洞穴，沾满了泥土与铜锈的文物，书简、典籍……，这许许多多人类智慧的密码，不知记下了多少神秘而动人的故事。头脑已经高度发达的近现代人类，从这些密码中不知破译出多少科学，不知发现了多少真理。正是在这些神秘而恢宏的历史流迹中，也萌发出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科学，生长出一棵人类政治智慧之树。

II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大自然对人类慷慨的赠予，也有大自然对人类的摧残胁迫；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帮助，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危机厮杀。当人类发觉那种“个人的存在”对于这种种危机、摧残与胁迫胜之无力时，便开始结成了群体去与大自然抗争，去与天奋斗、与人奋斗。于是便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便有了有目的的人类集体活动——狩猎、生产、战争……，于是便有了事实上的领导活动。而且就在这些深镌着原始痕迹的活动中，已开始闪烁出催动着一种科学之胚乳形成的智慧之光。

虽然，那个时代，人类还在茹毛饮血、巢宿穴居、刀耕火种、结绳记事，还没有创造出“领导”与“科学”这个概念。然而，这正如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形成系统的科学知识，虽然只是近现代的事，但是，却没有人会去否认人类的古代没有科学一样。事实上，人类科学发展史也早已证明：没有哪一门科学能够

超然于历史的源流之外从天而降。领导科学同样拥有其深远的历史源头，虽然领导科学做为——门学科在中国的土地上“腊鼓鸣、春草生”，才有十几年的光景。

人类亿千万年的历史积累之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古埃及用60万个车皮吨位的无数巨大石块建造的大金字塔，中国修筑的在地球上仍旧可睹的雄伟的万里长城，至今仍为现代建筑师讶叹不已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震撼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斯巴达克起义，人类农、工、商业的发展，直到政治体系的建立……，有人把这些归功于“管理”，那么，这其间凝结着的巨大组织作用、科学的功绩、领导活动的效能又该置于何处呢？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认为“管理”应居于“统治”之上。而我们在认真地回顾、思考一下历史和现实之后，却不能不说，“领导”更应居于“管理”之上。因为封建主义的统治不过是少数人用皮鞭宝剑，强按着多数人高贵头颅的压迫；资本主义的管理不过是少数人把多数人投入使其失去自由的，用计算机编织的精密牢笼；社会主义领导的实质则是多数人推举出他们先进的代表，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走在前面并与他们一起奋斗的引路人。

Ⅲ

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记下了东方的轩辕、神农、大禹、秦皇、汉武、孔孟、老庄、孙吴、李时珍、蔡伦……；记下了西方的亚力山大、凯撒、克伦威尔、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达尔文、路德、但丁、莎士比亚……。但是，芸芸众生——创造了整个人类文明的那些最平凡而伟大的作者，谁又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呢？于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又创造了两个大写的

字——人民。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才第一次把人民称为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第一次把人民的范畴做了科学的界定，第一次将其真正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深刻地论述着人民的地位、功绩时，并没有忘记和忽视那些走在人民前面的人的历史作用。

是的，我们只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不能不承认，再好的领导者，也永远不是“救世主”，不是“神仙”和“上帝”，但也永远不是一幅苍白无力的社会面具。任何伟人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规律，但是他们却可以凭借着社会的力量与掌握的权力和个人的素质，来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是曾经做出过“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利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的论断吗？

一个领导者，一个领导集团虽然不可能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环境的制约去创造出人间奇迹，而且常常会面临着无能为力的局面和形势，但是，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却可以在坏的体制下把事情办得尽可能的好一些，也可以在好的体制下把好事办糟；他们可能以需要为借口，把“破罐子”修修补补，保留百年，还自诩为“化腐朽为神奇”，也可能以失手为名把“新盘子”一旦粉碎，再大言不惭地说一声“重打锣鼓另开张”，他们可以给一个民族带来无穷灾难，也可以给群众造福百代；他们可以昂首引一个民族进通衢，也可以悄然导群体入歧途；他们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灾星”。

人民、群体、阶级、政党，如果有权利来选择，可要珍重，可要审慎。一旦把灵魂交给魔鬼去保管，一旦把权力授予潘多拉，人们失去的便不仅仅是利益，还要付出生命与血的代价。

IV

当我们面对着历史莽原上那些起伏跌宕的山川峰谷，不能不承认这都是历史“造山运动”的必然。当我们站在那些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座座纪功碑前的时候，又不能不感到由衷的自豪。因而，有人苍劲地唱出了“人是天地囚”的古老歌声，也有人雄沉地吟咏出“人定胜天”、“主宰沉浮”的现代诗篇。

是的，人类总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去进行创造，去发展前进。但人类并不总是去被动地接受历史。人类不可能让乾坤倒转，但也从不甘于被外物的绳索捆住了手脚。在自然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学会了“适者生存”，也懂得了“优胜劣汰”，因而也学会了在创造中发展。这正是人类的特性。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性，人才只所以成其为人，我们才会得以享有今日的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特性，那么，人类的一切便会悄然而逝。而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焕发出这种特性，从而使人类获得更大的自由。

历史属于前人，也属于我们，现在与未来只属于我们，却不属于前人。而拥有，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人类的天然使命不就是在不断地改变外物中也改变自己吗？

面对无情的历史、无常的自然、强大的社会，任何人都是渺小的，那是做为个人；任何人又都是伟大的，那是做为整体。最伟大的天才走上了危崖断桥，也会被深渊所吞噬，而无数个聪明才智创造力的迸发，就会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历史合力，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从而推动历史前进。如果把11亿个力的蕴藏开掘出来，并将其攒聚在一起，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任何核反应堆都无法相比的巨大动力源，就可以把我们推向现代化强国

的灿烂星空。我们已不再是睡狮，但也不能只是一头醒狮，而应该是一头扬鬣奋足的雄狮。

是的，从来就没有什么能够全部实现，也从来就没有什么是毫不可为。在理想与现实这个模糊集函数域值间不知有多么宽阔的领地，而其跨进的程度除去特定的条件制约外，不正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如何带领人们去奋斗了吗？

V

没有永恒的繁荣，也没有永恒的荒凉。

历史的河床总是在东西滚动。

大自然从地层深处推出了珠穆朗玛峰这个世界最高的屋脊，同时也在太平洋掘开了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那海沟。但是，又有谁会保证这屋脊与海沟的位置有一天不会颠倒过来呢？这将是自然历史的未来记录，而人类历史早已翻过了多少页这种沧海桑田的简册，而且还将继续翻下去。明月中天必令星海失色，但月亮并不总是当空辉映。一峰突起总有群山沉落，但哪一座高山也不会永在人间挺拔突兀。历史的脚步也总是在前后交替中前进。这也许就是一种“历史补偿律”。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率先从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创造了堪称世界一流的灿烂文明，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神秘而富有的东方“天国上邦”。而欧洲的日耳曼人直到公元五世纪的时候，才建起了一些十分落后，几乎没有城堡、没有文明的封建国家。而此时的美洲差不多仍旧是一片荒芜广袤，尚有待于人类去开垦的历史的处女地。东西方这种历史发展的时差，整整错位了一千年。

可是，在又一个一千年过去后的公元十五世纪末叶，西方大踏

步地跨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并且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迅速地发展起来。而我们的封建社会却在这关键的历史转变时期又绵延了几百年，我们开始步入了令人掩卷唏嘘、长歌当哭的“陆沉”时代。

16世纪的欧洲，正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凯列尔界定的中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所划分的“英雄时代”，而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比昂多等称为“野蛮”时期走向死寂的年代。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情地辗过了西欧封建时代一座座衰落的废墟，开始大步向资本主义的新世纪行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但是，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已经开始在西欧封建的废墟上生长。

由于15世纪末西欧封建制度内部矛盾的加深，以及此前的近东贸易危机的出现，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封建统治者和商人们的黄金渴望欲，早就驱动着他们开始了海外探险。而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完成则带来了新的地理大发现，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西欧殖民者从此开始了世界性的殖民掠夺。由于生产力迅速地发展，加速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到17世纪中叶，英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在18世纪中叶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正跨入至今仍为史学家所称道的传统小农经济的“康乾盛世”。此间，西欧发明的洋枪在1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没有几年，日本就创造出比西欧还先进的洋枪。而在乾隆年间西方“进贡”的洋枪，直到光绪年间，还陈列在颐和园中当玩物观赏。因此，在八国联军打破国门时，我们的战士和人民只能用古老的“大刀长矛”和忠勇的血肉之躯，去和屠人如割的洋枪利炮拼搏对垒……。多少志士仁人对此也只能把剑悲歌“莽莽神州叹陆沉”、“肠断难为五月花”而已而已。

这能归罪于我们的人民没有创造力吗？我们的火药不早就应

用于军事了吗？我们的祖先不曾开拓出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优秀的源流吗？如果说，世人赞赏日本人的“第二创造力”，那么我们的人民不仅拥有“第一创造力”，也不缺少“第二创造力”，同时也拥有强大的“第三创造力”。关键在于那个时代的制度、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在于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这难道不应该引发我们作深刻的历史反思吗？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疑为我们开辟了通达理想境界的康庄大道。改革开放又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在使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象正在裂变的核反应堆一样迸发。

1979年，日本企业界著名的经营专家——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来华访问时，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他对我国的电子工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有一条十分武断的结论：“如果你想通过电子工业挣外汇，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先利用你们便宜的劳动力为外国公司安装流水线。在同一家厂子里既生产国内产品又生产出口货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986年，这个武断的结论便被如东无线电厂率先打破了。

1982年8月，日本一家最大的机器人公司的技术部长对一名前来寻求合作的中国留学生说：“15年内，我们不准备与中国进行任何有关机器人方面的合作。”可是，在1985年，一位叫余达太的出国归来的留学生和他的同事们自行设计研制的中国造机器人，在来访的日本专家面前突兀地站了起来，直令日本机器人的“鼻祖”山下忠教授惊讶不已，回国后第二天就寄来了认为该机器人已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评价。正是这个余达太，在人们出国归来几乎都忘不了带“几大件”的时候，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23箱价值110万日元，与20台松下彩电等价的书籍，而且还在国外预订了5年的杂志。这不能不令许多国人汗颜。难怪海关小姐望着余达太的背影说出了一句真诚而发人深思的话：“这才是真

正的中国人……。”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何止一个如东无线电厂？在11亿中国人中，又何止一个余达太？谁能说我们的人民不聪明呢？谁能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呢？

如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么决定干部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因素”到位呢？如果在理论上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没有领导科学；如果在实践中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没有科学领导。

人才——领导人才，什么时候能够到位，什么时候能够陈力就列，野无遗才，那么，不仅我们的桌子都会跳起舞来，中国也一定会腾飞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VI

我们——曾拥有开辟鸿蒙的盘古，有过补天造物的女娲，有过追赶太阳的夸父，有过衔石填海的精卫，有过畚鍬移山的愚公……。

这既不是图腾意识的产物，也不是封建迷信的张扬，既不是英雄崇拜的赞歌，也不是天方夜谭式的传说。这是中华民族古老而英伟的民族魂的凝聚，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忠勇的守护神的化身。回溯历史的潮流，我们看到了，古巴比伦、亚述、波斯、贵霜、希腊、罗马……，这些在上古时代曾强盛一时，拥有辽阔疆域、巨大财富、文治武功的王朝帝国，少则一、二百年，多则五、七百年，不都先后一个个冰消瓦解、逝者如斯、“宫阙万间，都化做了土”吗？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尽5000年历史的巨大整合，战胜内忧外患，至今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正赖有这不可战胜的民族魂吗？！

回溯畴昔，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为了引悠久而饰虚荣，也无需去钩沉典而自伤。而是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无数勇于开拓廓清之“盘古”，补阙造物之“女娲”，执着追求不畏牺牲之“夸父”，也需要不畏劳苦、绵尽微薄、不止不歇、志在必成的精卫、愚公之精神。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把这古老而英伟的民族魂化为时代的精神，我们还有什么办不到呢？

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有着足资骄傲的文明。但是，在历史的简编中去认识规律比寻找骄傲更重要，开掘经验比张扬功绩更有价值，汲取教训比博引自豪更现实。那些具有远见卓识和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的领导者们，谁会忽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贞观名言呢？

VII

公元前340余年，被马克思称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收了一个学生，他就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在他后来执政的十几年时间，进行过10年东征，击败了大流士，消灭了强大的波斯帝国，迅速地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本人也成为了神话般的亚历山大大帝。但是在他死去之后，这个帝国便迅速地土崩瓦解。公元前221年，汉尼拔成了迦太基驻西班牙军队的统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他在意大利半岛与罗马帝国进行14年的征战，从没打过一次败仗。但却为国内妒火万分、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统治者所抛弃，拒绝增援，而造成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使其消灭罗马的一生宿愿破灭。公元前73年，在意大利半岛，一个色雷斯人斯巴达克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奴隶起义，吓得罗马帝国的奴隶主阶级无人敢出头露面竞选执政官。但是，由于斯巴达克冲出